

《我的长征》海报。来源网络

银幕见峥嵘·长征照初心

『麻雀艺评·坝坝电影龙门阵』走进古南街道

坝坝电影 龙门阵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麻雀艺评·坝坝电影龙门阵”走进古南街道，在农场社区开展“弘扬长征精神·光影铸魂育人”主题观影活动。社区居民齐聚一堂，观看影片《我的长征》，重温长征故事，感悟信仰力量。观影结束后，居民们从不同的视角谈感受、说理解，通过朴素的文字记录影片带来的触动，让电影的意义在个人感受与现实思考之间慢慢延伸。以下是活动嘉宾、观影群众对该活动和影片《我的长征》的观后感。

影片梗概

电影《我的长征》以15岁小红军王瑞的视角展开叙事。王瑞一家四口踏上长征路，惨烈的湘江战役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长征途中，他的其他亲人也相继牺牲，巨大的悲痛压在少年心头。他牢记“跟着走”的嘱托，继续跟随红军队伍前行。影片串联起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展现红军一路经受饥寒、险境与生死考验的艰苦历程。影片避开宏大的战争特写，依托少年的亲身见闻，展现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影片以个体成长映照宏大历史，让观众真切感受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仰，读懂长征精神的千钧分量。



观影现场谈感受。

众声回响

古南街道居民陈航：

看完《我的长征》，感触很深。电影里不止再现战火，还刻画了普通人在逆境中的坚守。长征路上红军相互扶持，绝不抛弃战友。我们工作中难免遭遇困境，偶尔想摆烂。想想先辈们绝境中仍不言弃，便在心里提醒自己：遇事多扛一扛，踏实做事。

古南街道居民王佑：

通过影片看到，红军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团结一致、奋勇前行，不惧牺牲、坚守初心。战士们用血泪和牺牲换来了胜利。电影给我启发：要心怀感恩，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脚踏实地、认真工作。

古南街道居民佘宗福：

看完影片，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先辈们拼搏、坚守、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奋斗换来的。我们当心怀敬畏、懂得感恩，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赓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古南街道居民潘国雄：

观看影片《我的长征》，感慨良多，红军将士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令人动容。作为退役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传承红色血脉，永葆军人本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嘉宾感言

綦江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熊勇：

本次活动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开展，重温长征历史，意义深远。古南街道居民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发言感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麻雀艺评·坝坝电影龙门阵”是綦江区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打造的特色品牌，我们将继续依托此类活动激活惠民电影工程，持续办好群众文化活动。

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会员钟家治：

观影最好的方式就是结合自身经历去感受影片，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主持人以母亲视角、退伍军人从战友情与家国情怀解读电影。主人公从懵懂少年成长为合格红军战士，是千千万万红军的缩影，也是人民军队成长的历史。影片借小人物的成长历程，展现长征路上的重重磨难，也体现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的宏大主题。

古南街道工作人员牛丽：

看完《我的长征》，内心满是震撼与感慨。影片以少年王瑞的视角，把长征路上的血泪与坚守娓娓道来。征途漫漫，风雪、战火、离别接踵而至，支撑战士们走下去的，是朴素而坚定的信仰。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去，这份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力量从未过时。历史照见当下，唯有常怀敬畏之心，方能把先辈留下的精神，稳稳接续下去。

文/熊勇 陈好 吴圣男 整理
图/符峻玮

影评节选

论《我的长征》的听觉世界

罗晓君

《我的长征》以王瑞的第一人称视角贯穿始终，这个“我”不仅在视觉上框定了叙事范围，更在听觉上构建了一个高度主观的声音世界。对这部影片的讨论多聚焦于个体视角对宏大叙事的突破，却鲜少有人追问：当长征从“他者的历史”变为“我的记忆”，声音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湘江战役的狂轰滥炸到飞夺泸定桥的静默突击，从父亲牺牲的瞬间到姐姐被残害的清晨，影片的声音设计始终与王瑞的内心世界保持共振，构成了一个被创伤与成长反复涂抹的听觉空间。

声音的缺席，是影片最含蓄也最有力的表达。瑞伢子不满十六岁却经历了家人相继牺牲，父亲倒在湘江边、姐姐死在彝区医院、姐夫葬身大渡河。对于这样一个不断失去亲人的少年，影片并没有用煽情的配乐去渲染每一次悲痛，恰恰相反——在多数牺牲场景中，环境声被压至最低，音乐也隐退为若有若无的气息。战争环境声淡出、音乐声淡入的处理，在王瑞个人化的叙事段落中被打破，留下大段“听觉空白”。父亲临终前那句“跟着走”之后，是长久的沉默；姐姐遇害的消息传来时，耳畔只剩风声与马嘶。这种声音的克制，比任何高亢的配乐都更能传递一个孩子面对至亲离世时那种无法言说的怔忡与钝痛。

然而，“跟着走”这三个字，却以声音的形式反复回响，构成了王瑞精神世界中最执拗的听觉锚点。从父亲口中第一次说出，到连长在战斗间隙的叮嘱，再到毛泽东同志在泸定桥头的感叹，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中一再出现，每一次的声调、语气和情绪都不尽相同。父亲说“跟着走”时是平静而坚定的，像是一种托付；连长说“跟着走”时带着命令的干脆；而毛泽东同志说这句话时，则有一种长辈的温厚与沧桑。台词和插曲反复强调的“跟着走”用得非常好，在于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声音事件——每一次出现都带着不同的情感重量。

当然，影片的听觉处理并非没有遗憾。部分战争场面的声音过于饱满，环境声的“充分、真实”有时压过了人物内心的细腻层次，使得本该留给沉默的空间被轰鸣填满。但瑕不掩瑜，当王瑞在片尾重回长征路，那些曾经令他恐惧、悲痛、困惑的声音都已沉淀为一种复杂的听觉记忆——那是他“最幸福的回忆”与“最痛苦的回忆”的合体。正是这种声音记忆的不可分割，使《我的长征》超越了普通的献礼片，成为一部关于个体如何在历史的喧嚣中辨认自己声音的电影。

镜头之下：看见身体里的长征

符峻玮

拍长征主题的电影，习惯把镜头架得很高。《我的长征》却把机位降了下来，降到十五六岁的王瑞眼睛那么高。所以我将绕开“信念”“牺牲”这类词语，只谈这部片子里最平凡的元素——身体。

这个少年的长征，首先是按身体的尺度丈量出来的。步枪几乎和他一样高，他得斜挎着、拖着走。一条江的宽度，是竹筏在浪头里挣扎的那几分钟。一座雪山的高度，不是海拔，而是他当天剩下的那点力气。影片里的山河都不是地理名词，而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孩子用脚板、肩膀和肺，一寸一寸走出来的。

然后是亲人们的身体，一个接一个退场。父亲沉进了湘江，姐姐和姐夫也没能走完这条路。影片拍死亡几乎不渲染，它只是让身体消失：前一晚还在替你紧枪带的人，第二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喊全。这种克制的拍法比任何悲壮配乐都冷，它逼着观众像少年一样——没时间哭，只能继续走。

我认为全片最高明的地方，是把“最高的人”也放低了。片中的“毛泽东”形象并非一个符号，他会在篝火边和这个小兵说话，会弯下腰来，让自己的视线和一个孩子齐平。这一弯腰，把“领袖与士兵”的宏大命题，转换成了一个具体的动作：在这支队伍里，人和人的高度差，是可以被体温抹平的。

结尾最有分量。七十多年过去，年老的王瑞重新讲起十五岁那年的出发。银幕上那个佝偻、苍老的身体，和记忆里那个瘦小、滚烫的身体叠在一起。这部电影拍的一直是同一个身体：它扛过枪、熬过夜，一次次把亲人留在路上，最后自己变成一座活着的纪念碑。

两万五千里在教科书里是一个数字，在《我的长征》里，是一双脚板的长度，是一段记忆的厚度。这个会疼的身体，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才配成为永恒的历史。

从“跟着走”到信仰的力量

陈好

观看《我的长征》，没有被宏大的战争场面震撼，却被影片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打动：少年王瑞接连失去所有亲人，悲痛无助、孤独绝望，却始终记住亲人嘱托：“跟着走”，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这个细微的人物片段，让我读懂了真正的长征精神。

影片中，王瑞原本拥有温暖完整的家庭。一家人满怀希望跟随红军出征，可残酷的长征路上，离别接连发生。湘江战役中，父亲壮烈牺牲；后续行军时，姐夫、姐姐也相继倒下。短短一路，年少的王瑞亲眼看着至亲一个个离开自己。他只是一个孩子，本该无忧无虑，却在战火中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与孤独。

最触动人心的情节还有：即便悲痛到极致，即便身边再无亲人依靠，王瑞从未掉队、从未抱怨、从未放弃。每当迷茫无助时，他都会想起亲人临终那句朴实的叮嘱“跟着走”。没有华丽的誓言，没有激昂的口号，这简单的三个字，支撑一个孤苦少年熬过雪山严寒、草地饥荒、战火凶险，坚持走到最后。

长征的伟大，从来不只有英雄壮举，更来自普通人于绝境中的坚守。千千万万像王瑞一样平凡的战士，带着思念、带着伤痛、带着信念一路前行，才铺就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他们不是天生勇敢，只是选择咬牙坚持；不是无所畏惧，只是初心从未动摇。

反观当下部分青年，衣食安稳，遇上些许压力挫折便容易懈怠退缩。对比王瑞的经历，这些困难微不足道。影片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在于困境中坚守、磨难中前行。我们要把坚韧刻在心底，传承红军不畏艰难、永不言弃的精神，踏实勤学、主动担当，摒除浮躁、迎难而上，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跟着走：用生命写就的答案

宣政豪

历史是什么？是无数个体命运在时间之流中交汇成的长河。而《我的长征》之所以震撼，正在于它没有让这条长河淹没掉一滴水——让一个十五岁少年的眼睛，成为我们凝视那场伟大迁徙的窗口。

瑞伢子踏上征途时，尚不能说出“主义”为何物。他记住的，只是父亲凝望毛泽东同志背影时留下的那句朴素得近乎无力的叮嘱：“跟着走。”这三个字，在哲学的意义上，恰是人在虚无与绝望中给出的第一声回答。当湘江的血染红了江水，当父亲的躯体在炮火中倒下，一个少年的世界坍塌了；而“跟着走”，便是他在破碎的存在之上，重新为自己寻得的那一点意义支点。

从湘江到遵义，从娄山关到凉山彝区，再到飞夺泸定桥的十三根铁索，我们看到的，是用血肉之躯对抗命运与时间的史诗。父亲、姐姐竹妹子、姐夫肖德昌、彝族兄长达尔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相继陨落，完成了某种不朽。这正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个体的消逝，并不意味着意义的终结。恰恰相反，正是无数平凡生命的牺牲，才让“长征”从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图腾。那些战士未必能说清何谓真理，却用最朴素的行动，回应了“人为何而活、为何而死”这一终极之问。

“跟着走”，看似被动，实则暗含最深刻的自觉——那是对方向的辨认，对信仰的托付，对历史必然性的朴素直觉。它不是盲从，而是一个人在看清了前路的泥泞与雪山之后，仍选择义无反顾地走向那束微光。这束光，是理想，是民族的前途，是每一个普通人对“更好的世界”的信仰。

七十年后，白发苍苍的王瑞老人重走长征路，喃喃祈愿：愿痛苦的回忆少一些，幸福的回忆多一些。这句朴素的心愿，正是先烈们用生命写就的答案。

《我的长征》的空间及类型表达

杨鑫蕾

在以往长征题材的电影里，常把两万五千里摊成一张俯瞰的作战图，比如箭头、番号、会址标明清楚，让地点和空间用来交代战略，人只是图上会移动的小点。而电影《我的长征》却选择了另一种风格。它把平面的地图“折”起来，塞进少年王瑞的鞋底。空间在电影中不再是背景，它参与电影的叙事。影片从全景史诗，慢慢转成一个少年一路长大的故事。

湘江战役的场景极具特点，镜头只盯住浮桥木板在浪里一沉一浮。暗红色的浑水往下游淌，担架、背包、马匹挤成一条眼看要断的窄线。同样是翟俊杰导演，1996年版《长征》拍摄湘江战役，多用俯拍渡口、作战部署图的镜头，这套空间叙事，意在阐释“决策为何正确”。而在这部电影里，江水不解释，只把人一个个带走；亲人不是“牺牲于某次战役”，而是从晃动的木板上挨个不见。

遵义会议则正好反过来，把空间叙事收紧。柏辉章公馆的青砖天井、窄楼梯，二楼窗棂里那盏煤油灯，是个隐蔽的地方。机位常在门槛或楼梯转角，屋里在商议接下来往哪走，屋外是端着碗、够不着门把的少年。历史的洪流就像一道无形的门，没让他进去，可他就站在这道缝里，好像又在悄然之间醒悟。大部分电影会以全景、正面讲话和整齐的群像表现会议，但本片用“站在门外”这一空间表达，反而让观众更为动容。

泸定铁索像一道坎，雨夜、峡谷、对岸火光，让“过桥”成为了悬念最高点；夹金山则把对手从敌人变成了呼吸，冰碴、雪线、张不开的嘴；到了草地，方向迷失，没有山头可指，没有村名可报，一脚踩下草甸就冒黑水。在空间叙事的处理上，导演将“场域感”减弱，于是“走到哪”似乎不重要，但“还剩谁”最为关键。

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一二版金方霞 三四版刘琦 校对：一二版吴越 三四版周铉